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选择 与哲学转换

纳麒
谢青松
著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选择 与哲学转换

纳麒
谢青松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D23
N03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选择与哲学转换 / 纳麒, 谢青松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 - 7 - 5161 - 0619 - 8

I. ①中… II. ①纳…②谢… III. ①中国共产党 - 党史 - 研究 IV. ①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823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王俊超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625
插 页 2
字 数 250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1)
一 中国共产党的目标追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
二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选择：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7)
三 中国共产党的哲学转换：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	(12)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目标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9)
一 文明古国的衰落与民族复兴的提出	(19)
二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目标追求的确立	(33)
三 走向民族复兴之路的伟大探索	(43)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选择：新民主主义革命	(67)
一 国共合作战略及其历史意义	(68)
二 “两步走”战略及其实现路径	(73)
三 统一战线战略的提出及实践	(85)
四 人民战争战略思想及其战术	(96)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选择：社会主义革命与早期社会主义建设	(108)

一	过渡时期的战略选择	(108)
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战略选择	(119)
三	“文化大革命”战略及其反思	(133)
四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战略的确立	(142)
五	“和平共处”外交战略的确立	(150)
六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战略	(158)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67)
一	从闭关自守到对外开放	(167)
二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175)
三	从轻视知识到科教兴国	(187)
四	从偏重人治到依法治国	(197)
五	从政治挂帅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209)
六	从经济单边突进到科学发展	(217)
七	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的构建	(229)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的哲学转换：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	(240)
一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与“斗争哲学”的选择 ..	(240)
二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与“和谐哲学”的选择 ..	(246)
三	“和谐哲学”的本质：从“两功能”向“三功能”的跃迁	(256)
主要参考文献		(265)
后记		(269)

导 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 90 年来，伴随着中国历史的风风雨雨，中国共产党人饱尝了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低潮与高潮、挫折与胜利、忧患与喜悦的情感变迁，经受了一段异常复杂的心路历程。在建党 90 周年之际，我们从历史与逻辑的双重维度梳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轨迹和战略选择，探寻其背后所蕴涵的理论创新与哲学转换，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今天的中国，努力去实现明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的目标追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通过 90 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已经使中国由一个任人宰割、备受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发展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由一个战乱不止、国贫民弱的悲惨局面转变为社会政治稳定、初步繁荣富强的小康社会，中华民族距离伟大复兴的梦想也越来越近。

（一）文明古国的衰落与民族复兴的提出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团结奋斗、自强不息，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纵观中国历史，古老而强大的中华帝国曾经在几个世纪绽放出一幕幕的盛世光环，从“文景之治”到“贞观之治”，从“开元盛世”到“康乾盛世”，都堪称盛世辉煌。直至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前，中国始终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是一个疆域辽阔、多民族融合的世界文明古国。可以说，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文明曾在很长时期内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影响和推动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

然而，19世纪前后，当英法等国的工业革命业已完成，中国却从“康乾盛世”逐渐走向衰落。在整个世界的变局中，长期雄踞东方、熠熠生辉的文明古国开始落伍于西方世界。

1840年6月，英国将侵略的矛头对准了这个处于颓势中的古老国度，发动了蓄谋已久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的失败以及《南京条约》、《虎门条约》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也由此陷入了万劫难复的深重民族危机之渊。在此后的数十年间，美国、法国、俄国、日本、德国等列强纷至沓来，通过军事威胁与武装入侵，强迫清朝政府与之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如《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所有这些不平等条约，又都在《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西方列强的侵略特权。至此，拥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古国，在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逐渐进入了一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屈辱时代，中华民族的危机也开始越陷

越深。

随着文明古国的逐渐衰落和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广大国民尤其是一大批有识之士开始思考中华民族的未来，苦苦寻求民族复兴的方案。从鸦片战争以后的数十年历史进程中，“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能否以及如何复兴”等问题始终萦绕在中国人民的心中。这些对“民族复兴”问题的思考与求索不断汇聚成奔涌向前的思想潮流，成为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滥觞。

1894年10月，28岁的孙中山怀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感，从上海乘轮船经日本赴美国檀香山。11月24日，他团结20多名华侨，在火奴鲁鲁美商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寓所，发起成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章程》明确提出了立会的宗旨：“振兴中华，维持国体”，并规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作为兴中会的奋斗目标。自此，“振兴中华”便成为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唤起民众、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口号。1932年5月，以张君勱为首的国社党（后改名为民社党）创刊《再生》杂志，明确把“中华民族复兴”作为办刊宗旨，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复兴方案。张君勱在《再生》杂志上先后发表了《我们要说的话》、《中华民族之立国能力》、《民族复兴运动》、《民族观点上中华历史时代之划分及其第三期振作》、《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和《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等论文。与此同时，他还以“再生社”的名义，将其30年代初期在全国各地的相关演说汇集成册，于1935年出版了《民族复兴之学术的基础》一书。在他的努力呼吁下，20世纪30年代初，“中华民族复兴”作为一种思潮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蔚起，有关言论也逐渐流行，民族复兴思潮的流行，不啻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实践做好了坚实的理论铺垫。

（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目标追求的确立

近代中国多灾多难，备受凌辱，诸多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各种政治力量竞相登上历史舞台，各种民族复兴方案接踵出炉。在如此多的可能性之中，历史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民族复兴的理论武器，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选择了社会主义作为民族复兴的现实路径。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民族复兴理论武器的确立。

当西方的坚船利炮冲开了近代中国的大门，国外的各种理论思潮亦纷至沓来。一大批有识之士也提出各种理论和方案，试图引导中国迈上救亡图存的道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拜上帝教”、“尊孔复古”、“三民主义”等思想先后流行于世，但它们都只是昙花一现，而未能帮助中国人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找到解救中国的真正出路。就在中国革命陷于迷茫与困境之际，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震惊了世界，创造了历史，也震撼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冲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束缚，从学习西方转向学习俄国，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的社会，思考民族衰败的原因，探索改变现状的方法，寻求救国救民的途径。经过反复的比较和斟酌，马克思主义最终被确立为民族复兴有力的理论武器。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其主要表现有：其一，《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和国外阐释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出版。其二，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这些进步团体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成为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

地。其三，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逐步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壮大了马克思主义者队伍。其四，一些先进青年到工厂矿山调查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有效地促进了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尤其是毛泽东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广泛而深入地传播，从而有了更为真诚的载体。至此，马克思主义逐渐战胜其他社会思潮，成为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尤其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开始被确立为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理论武器。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民族复兴领导力量的确立。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来组织、领导人民去实现。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立宪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都试图成为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但由于它们各自的阶级局限性，最终都归于失败，而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后，迅速被确立为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中国的历史从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作为古老东方大国的中国，自从清王朝在西方坚船利炮冲击下走向崩溃以后，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始终处于社会失序、政权更迭、民不聊生的境地，而在帝国主义支配下几乎彻底失去了必要的外部发展空间，其所面临的内外压力前所未有、世所罕见。在如此险峻严酷、复杂艰难的时代背景之下，要改变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不断被边缘化的处境，维护民族的尊严，进而实现民族之复兴，首要的问题在于重建国家政权，寻求民族独立。而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上看，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必须有一个适应时代要求、能够肩负起领导责任、能够明确与内外反动势力划清界限的现代政党。由于西方列强的长期欺凌和压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始终力量羸弱，而且因为与外国势力利益关系的复杂纠葛而具有

与生俱来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试图担负起中国民主革命大任的良好愿望只能落空。后来随着中国内外矛盾的复杂演化，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代表工农阶层和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赞同和拥护。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最终责无旁贷地交给了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漫长征途中，这无疑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这是因为，中国人民经过百年求索和千锤百炼，终于找到了引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力量。

第三，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与民族复兴基本道路的确立。

在近代中国，面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中华民族的危亡，各阶级、各种社会阶层、各派政治力量，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争取国家的富强，提出过各式各样冀求走向民族复兴的救国方案。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到洋务运动的实践，从维新派主张通过改良道路向西方学习政治制度的戊戌变法，到革命派高举革命大旗实现政治制度变革的辛亥革命，每一次的历史变革都曾给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希望，但每一次的结果都让翘首期盼的中国人空手而归，求富求强的愿望最终化为泡影，民族复兴大业更是遥遥无期。究竟怎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真正引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正当中国人迷惘不堪、无所适从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为中国指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终于为中华民族复兴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社会主义道路。

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作为新兴的社会制度，正显示出勃勃的生机和无比的优越性，它对于在黑暗中苦苦求索的中国人而言

无疑像一盏照亮前程的明灯。中国的先进分子正是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中得到启示，找到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是一条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格局下落后国家通向现代化的崭新道路，其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经过艰辛探索而逐步开辟出来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之路、必由之路。

二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选择：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做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带领中国人民在通往民族复兴的路上苦苦求索。在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采取了不同的战略抉择，即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从教条而又经验式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完整目标体系的政党，早在1922年7月，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一年，中国共产党便在“二大”上制定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然而，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我们党遇到许多特殊而复杂的问题需要回答。例如，中国革命是走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先由资产阶级领导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由无产阶级领导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在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后，紧接着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战略上作出回答的重大问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总结近代以来中国救亡图存运动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吸收马克思主义中符合中国实际、对中国革命有指导意义的思想，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理论与实践。按照毛泽东同志的理解，中国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由两个不间断的过程组成：其一，由共产党领导完成资产阶级所不能彻底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一种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革命的任务，并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其二，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利用政权的力量继续推动又一场新的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从而实现现代国家的建构，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毛泽东作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清晰阐述：第一，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大目标，我们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因此，两个革命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第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犹如一篇文章的上篇和下篇，只有做好上篇，才能去做下篇。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无法着手做的。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第三，从经济看，我们进行的革命是要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它既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又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了更广大的道路。它将促使资本主义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同时又会促使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第四，从国际环境看，由于中国革命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所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的终极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经过 28 年的艰苦奋斗，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此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悲惨状况，雪洗了中国人民任人宰割、受人欺凌的百年耻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未来走向，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新中国的成立，既标志着第一次重大历史性转变的基本结束，又标志着第二次重大历史性转变的开始。从新中国成立到 1956 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短短的七年间，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种种困难和复杂局面，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和巩固各级人民政权，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彻底摧毁了旧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转变。

（二）从教条而又经验式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历史帷幕。然而，由于执政经验的缺失和执政理念的错位，我们党在 1978 年以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走上了一条教条而又经验式的道路。在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上，我们教条式地照搬了马克思关于“公有”和“计划”的结论，忽视了马克思的结论是对实现了的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理论概括，忽视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设起点上的社会主义，忽视了中国社会状况的特殊性，把需要经过长期建设和发展过程才能实现的目标放在过程的起点上欲加实现，从而使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其后的建设走上了脱离中国生产力水平、超越中国社会现实的道路。

在“公有”与“计划”体制的背景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又犯下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亦即照搬革命经验搞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作为革命党时的革命实践，主要表现为战争实践；另一类是作为执政党后的执政实践，主要表现为建设实践（社会治理和国家建设）。两类实践在性质和特点上是完全不同的，而在时间上却是相互连接的，加之两类实践活动的领导主体基本上是同一批人，在两个实践和主体角色转换的历史时刻，人们无暇进行必要的思想准备、观念更新、技能培养，甚至来不及脱下军装，承载着丰富的战争经验便匆匆从战争指挥员转变为建设的领导者，从革命者转变为执政者。这种转变往往在一夜之间便完成，于是，以革命党的理论指导实践，以战争的经验指导建设的现象发生了。

阶级斗争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的根本理论和根本方法，在这一根本理论和方法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组织革命武装，开展革命战争，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后打败了敌人，夺取了天下，建立了国家政权。靠阶级斗争夺得了政权，难道就不可以靠阶级斗争去巩固政权和建设国家吗？于是，在两个实践转换的关键时刻发生理论与实践的错位，把战争的理论 and 经验移植到执政实践中来也就“顺理成章”了。于是，“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也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理论指导，“抓革命，促生产”也就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战略思想和推动方式。

制度安排上的教条主义与建设方式上的经验主义的有机结合，形成了1978年以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发展模式。其根本特征是“非均衡性”，着力点是“革命”，即阶级斗争、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等，“生产”即经济建设是在“抓革命”的前

提下来推动的。虽然，也曾以全民动员的方式掀起过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建设高潮，然而，当“革命”和“生产”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人们宁愿放弃和牺牲“生产”也要确保“革命”，不断地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发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思想运动，客观上冲击了生产，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这种情形发展到了极致，停工停产“闹革命”。此时人们崇尚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理念，正是这种发展模式“非均衡性”特征的真实写照。在这种模式下，中国经济出现了全面衰退，“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经济的衰退，一方面促成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另一方面预示着充满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色彩的传统发展模式也走到了尽头。

“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样的现实引发了人们深深的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此时的党中央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说，“按既定方针办”，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思想；另一种声音说，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重新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之路。中央存在的矛盾和分歧反映到社会层面，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全国性的理论大讨论。邓小平同志支持并领导了这场大讨论。大讨论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具体理论观点切入，直指“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思想，最终拓展为席卷全国民众的思想大解放运动，这为中国发展之路的重新选择、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成为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模式和“两个凡是”的僵化观点，作出了终止“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模式的果断决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发展战略；全会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全面拨乱反正、实施改革开放的总路线和总政策，邓小平同

志全面设计了“三步走”的宏伟蓝图，开启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独立自由和国家繁荣富强为己任，在几个世纪的探索中，历尽曲折，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中找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作出的又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执政方略、执政方式和执政体制等方面逐步实现从“打天下”到“治天下”、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真正转变，从而开辟出治国理政的新道路。

三 中国共产党的哲学转换：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治地位和历史角色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亦经历了一个转换的过程，即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的转换。尽管这种转换并非是自然而然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颇为曲折的过程。

（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与“斗争哲学”的选择

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凝聚，哲学思想不仅体现特定时代的意义追寻和价值创造，同时也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变迁。就一个政党而言，它的执政理念和哲学基础必然要与它所处的政治地位及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相适应。在革命时期，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斗争哲学”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与其特定的历史角色、政治实践及社会背景有着直接的关联。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中华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封建军阀的残暴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领导中国人民走出苦难的深渊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伟大历